

二胎时代:面向未来的选择(上) ◆ 穆光宗

翼城实验 给了我们启示

1984年,人口专家梁中堂在山西省翼城县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写了一篇题为《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研究报告并呈送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提出如果国家采取晚婚晚育和延长生育二胎间隔时间的办法,既可以在2000年前把人口控制在12亿左右,同时又能满足大多数农民的生育意愿,两全其美。1985年7月,经上级批准,翼城县农村开始推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政策,要求已婚女性不早于24周岁生育第一胎,30周岁后可生育第二胎。迄今试点已经年,结果如何呢?数据表明,翼城人口生育率不升反降,人口增长率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根据统计,1982年到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山西省增长了28.4%,翼城县仅增长20.7%。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人口增长情况显示,全国人口增长率5.84%,年均增长率0.57%;山西省人口增长率9.98%,年均增长率0.96%;翼城县人口增长率2.71%,年均增长率0.27%。这一现象耐人寻味。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县,翼城在相对宽松的政策空间中生育率却明显下降的“秘诀”是什么?翼城的经验或许可以为全国计生政策的调整提供可贵的启迪。

其一,低生育率属于意愿性和内生型。一个关键的事实是,90年代后期以来,翼城农民的生育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想生二胎

2015年岁末,全面放开二胎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的一件大事,意义深远。北大人口所穆光宗教授是我国研究人口问题和老龄问题的资深学者,他在自己新近出版的《人口生态重建》一书中系统回溯和深刻反思了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演变历史、改革进程和近忧远患,从战略高度提出了有关低生育陷阱、欢迎“婴儿潮”、人口安全是国家安全基础、适度生育和优化生育、未备先老、不健康老龄化、重建人口生态、人口问题观决定人口治理观等一系列创新观点,对于启蒙国人树立全新的家庭友好、发展友好的积极人口观和生育观大有裨益。本版摘录内容选自该书。

的人少了,许多家庭普遍只生一胎。翼城县农村越来越多的“80后”、“90后”夫妇选择只生一个,总和生育率已经低至1.78。翼城县计生局2012年统计数据,翼城农村家庭的一孩率达到42%。在先后试点的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也取得了稳定和巩固的低生育率成果。生育率下降有自己的规律和路径,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如果说在1990年代初期,我们观察到的是政策性的低生育率,例如1992年我国人口统计第一次报告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TFR)下降到1.7左右,虽然低于更替水平生育率,但仍然高于1.47的政策生育水平;然而到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时候,TFR已经快速下降到令人震惊的1.22,即使考虑到漏报因素,估计也不过是1.4左右,已经低于政策生育率,或者亦可说已经从“外生型政

策性低生育”转变为“内生型意愿性低生育”。与此同时,有代表性的调查发现,年轻妇女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下降到1.6左右,“晚婚晚育、只生一孩”的超低生育文化逐渐形成和蔓延,甚至不生育文化也开始出现,人口再生产类型和生育模式在城乡、地区和阶层之间出现高度的趋同性。

其二,发展是最好的避孕。在当代中国,作用于人们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的因素不仅仅有计生政策,而且有经济社会发展因素。在理论上,我们认为有四种不断增强的力量共同驱动低生育率现象的出现和蔓延,即行政控制力、利益诱导力、经济自发力和文化驱动力。大概从1990年代开始,年轻一代进入了高生育成本抑制生育意愿、约束生育行为的低生育率时代。翼城农民的生育理性表现在以下的觉悟:“以前



生一个就能养,现在的娃娇贵,到处都要花钱。”人们的生育日趋理性,在高抚养成本——低生育收益的关系中越来越多地选择“只生一个孩子”,印证了1974年布加勒斯特第一次世界人口会议提出的“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这一著名的人口学命题。卷入了现代化过程的中国农民也不例外。决定生育行为的主要因素已经不是行政控制力或者政策强制力,而是经济自发力和文化驱动力。

其三,生育率大幅反弹的说法没有依据。总有人质疑:政策放开二胎的话,会不会导致生得更多。这种线性的看法演变为“一放就乱”的担心,“低生育率可能大幅度反弹”成为阻止生育政策调整的一个莫须有的“依据”。事实胜于雄辩,翼城等地的试点证明了生育率不断下降才是经济社会现代化背景下人口发展的

必然趋势。事实是,弹簧压久了就会逐步丧失弹性,政策高压下的生育率反弹特性也会随着时间的流失而逐渐失去。无论富人还是穷人,生育行为的背后都有理性的力量在持久地发挥作用。经典的理性预期假设适用于生育主体的生育决策,生育的成本——收益理论可以很好解释低生育形成的微观机制。

翼城的生育率变迁早已突破单一的生育政策解释生育行为的理论框架,证明了急剧的社会转型和快速的人口转变其实是如影随形的一个变革过程,中国农民连同他们的生活世界一同走向了现代化,乡土中国迎来了历史性的低生育时代,高生育时代恐怕是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已经完成急刹车的历史使命。中国需要有新的世界眼光和历史眼光认真审视和评估从1990年代初出现的低生育现象以及2000年以后持续的超低生育率问题及其深远的社会经济影响,将巨大的人口变迁放进民族复兴的大业中重新考量,大国的人口观必将别开生面。如果我们理解了翼城的变迁其实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那么她就像是一个睿智的“过来人”开示了我们许多,中国的人口转变也蕴藏着上述规律和本质,翼城经验可以成为国家调整计生政策的重要参考,放开二胎不仅没有什么大不了,而且要汲取翼城以持续的低生育率为指向的教训;相反地,如果我们仅仅将翼城看做是转型中国的一个“孤案”,那么她还就是她,试点虽好却于国无助。

快递中国

——中国农民的梦想与辉煌

朱晓军 杨丽萍



39.总有意外发生

面单加价是件敏感的事情,哪怕仅加一分钱,哪怕这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也会遭到一部分加盟商的抵制。抵制最强烈的是北京和广东两大加盟商,中通已实现对绝大多数省级公司的直营,广东中也归到了总部,北京和三级加盟商——地级市一级分公司,以及其下面的网点还没实现直营和一体化,仍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互助基金在理事会第一次讨论时,不了了之。

全国每天有一百多万快递员穿着蓝色、红色或黄色工装,带着“快递三宝”——“电驴子,泥腿子,话机子”,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城市的车越来越多,路越来越窄,绿灯一亮,憋在路口的车夺路而去,快递员夹杂在其中,他们的电动车后货架堆得像小山似的颤颤巍巍,车不稳,视线差……

2011年杭州发生一起惨案,快递员小袁骑着电动三轮车送件时,被一辆厢式货车撞飞,失去年仅20岁的生命。小袁是家里的独生子,父母的那片天塌了。申通是加盟制的,加盟商不愿承担责任,拒绝认定小袁是工伤。父母被逼无奈,只得跟儿子生前的公司对簿公堂……

2005年10月的半夜10点钟,一辆车厢上有着快递公司LOGO和名称的面包车在广州自燃。司机跳下车,慌忙打开车厢的门往外抢快件,可是哪里抢得过来,大火很快就把整辆车吞噬。

刘干荣是“三通一达”之外的一家快递公司的加盟商,创业初期买不起新车,购了三部二手中等厢式货车。也许是零件老化了,也许是“双十一”期间跑得狠了点儿,一辆车刚离开网点就自燃了。接到司机电话后,刘干荣抄起灭火器,领着几个员工赶了过去。一边跑一边祈祷,这火千万不要燃到车厢,千万不要发生爆炸!车里装着价值80多万元的服装,一旦烧毁,刘干荣就倾家荡产了!那场火终于扑

灭了,还好车烧毁了,货还在。刘干荣再也不敢用那三辆二手车了,租车来跑运输。年底,他狠下心,买了两辆新车。

在快递行业,交通事故频频发生,除像小袁这样在车祸中身亡之外,还有车辆自燃。有一年,中通连接发生多起车辆自燃,损失较大。中通有史以来最早的一次车辆自燃不仅烧毁商学兵的一辆新车,还将一车快件化为灰烬。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商学兵拎着钱袋子挨家挨户地登门道歉,赔偿客户损失,搞得他差点倾家荡产。

随着快速爆炸式发展,渐渐步入中国十大高危行业。快递员每天要干十多个小时,送一二百票快件,忙得常常连饭都顾不上吃,似乎他们只待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在送快递,一个是在送快递的路上……

一位汇通快递员外包司机,像蚂蚁搬家似的往返于金华与昆明之间,4天一个来回,紧张而繁忙。一天,车和所载的快件都到了金华,年仅38岁的他却坐在驾驶座上走了,撒下那辆日行千里的货车,还有等待他的薪水买菜、上学读书的妻小。

邱厚金比那位司机还年轻一岁,他是位仅做3个多月快递的快递员,从早晨6点多钟忙到晚上八九点钟,一个人装车、卸车、开车、送件,一刻也不闲,刚打电话给一家公司的主管说货到了,他就把20箱POS机卸下车,然后再搬上电梯,送到16层。件送到了,他却手捂着胸口一个跟头摔在地上。经医生诊断为中心源性猝死。

一位京东商城的26岁的快递员也死于过劳。他每天要送二百来票货,有大有小,搬上搬下。物流越来越成为电商的核心竞争力,京东商城特别强调送货“快”,在有些城市哪怕是半夜下单,第二天下午3点钟前也要送达,这样紧张而高效的送件即便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也难以承受。

每每听到这类消息时,赖梅松都心惊肉跳,为“中通的家人们”担心。每一个“家人”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每位“家人”倒下都是一家人的悲剧。对这些来自农村的快递员来说,他们的家就像破旧的小渔船,抗风险能力很低,一旦发生意外,那个家也就是咸鱼难以翻身了。

没过多久,赖梅松又在理事会上提出成立中通网络互助基金。

38.最好的召唤

“许处长,用什么样的口吻通知他们?”林宇婧问。

这个时候,任何说教、任何言辞都是贫乏的。“什么也别说了。”许平秋道,扬扬头安排着,“下载一首他们的校歌,循环播放。我去参加一个会,下午六时我会到场,宇婧、高远,你们两人负责接待。”

队员敬礼领命,许平秋却是心事重重地走出了这里。不一会儿,林宇婧和高远也下了楼,抱着一堆设备,直奔天河体育场警体训练馆,那儿还封存着所有学员的私人财物呢。

“校歌是什么歌?”高远问。

“所有警校的校歌都一样,《人民警察之歌》,笨死你呀。”林宇婧道。高远笑了笑,驾车起步,再要问时,林宇婧把手机旋转到汽车的音箱,刹那间雄壮的旋律响起,两人也在这一瞬间,感觉到了心中升起一种肃穆的感觉。

“这是最好的召唤。”林宇婧肃穆地轻声道。

手机响了,接听时是熟悉的旋律,董韶军知道回归的时间到了,他有一种难言的兴奋充斥在胸间,他扔了赖以生存的大麻袋,踢掉了透着脚趾的鞋,找了个池塘洗了把脸,整了整衣领,拦了辆出租车,开始了他四十天里最奢侈的一个行动:回归。

手机响了,张猛在吸溜着鼻子,低头看到的是泥迹斑斑的工地,抬头看到的是高耸入云脚手架,看看自己,出来时穿的衣服已经是衣衫褴褛,自己累死累活,在回归的这一刻还是身无分文,前一天晚上他向工头预支工资,不给;借钱,也不给,此时他想了想,确实还有一件最想做的事。他洗了把脸,整了整衣领,把铁锹往钢筋架上一砸,断了,然后他走出工地,到了工棚,等着工头那辆车驶来,远远地喊着:“李工长,等等,我有事跟你说。”

“不好好干活,说什么?甭指望借钱啊,工地有饭吃,那边草棚有地方睡,还花什么钱?”李工头翘着小胡子道。可不就是嘛,饥饿和住宿都能解决,幸福就像电视上说的那样,天天有。

“我干这么长时间,有句话一直想对您说,再不说我没机会了。”张猛严肃道。那李工头毫无防备地上来,还是一副撵猪赶狗的表情,不耐道:“有什么快说,说完干活去。”

“砰”的一声,工头喊都没喊出来,碗大的拳头直打到脸上了。他应声而倒。胸中怒气尽去,张猛提步就跑,大步流星地向西南方向奔去,那是归队的地方,那里有兄弟、有朋友、有组织在等着,再也不用受他妈这等鸟气了。

手机响了,此时的孙羿已经收拾好行李,他没想到自己居然能在滨海这座城市找到卡丁车陪练的活,而且干得不赖,认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人,昨晚喝酒那帮天南海北的兄弟还挽留自己呢,他斟酌了良久还是决定回去。不过他也已经做好打算,如果招聘无望,那就再回来干自己喜欢的事。

多了一份选择,也就多了一份信心,离开望江路租住地时,他甚至有点恋恋不舍,这儿和这个城市,似乎比集合地对他的吸引力更甚。

手机响了,余罪、豆晓波、李二冬同时打开,也同时听到了熟悉的旋律——《人民警察之歌》。旋律中有一股金戈铁马的铿锵感觉,更有一股让人热血沸腾的情绪。余罪听着,看了同伴两眼,慢慢地说着:“家里在召唤了,该回去了。”

他又看了房间门一眼,隐隐地还能听到细妹子嘤嘤的哭声。鼠标哥为情所累,从昨晚对细妹子说要走,细妹就哭个不停,偏偏鼠标慑于保密条件,连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家庭住址都不敢透露。

还有更痛苦的,余罪回头时,看豆晓波和李二冬一脸难色,比当初糊里糊涂跳下车还难。

“哎,余儿,你说我需要不需要向组织坦白呀?”豆晓波道,那些小广告说白了全是非法广告,你说这事都干了,组织还会原谅吗?

“就是啊,我心里也没底,要不咱们别说,这事说出去得多丢人,别说将来当警察,都不好意思回学校了。”李二冬道,饱暖之后,开始有羞耻心了。

余罪:我的刑侦笔记

常书欣

